

风起于青萍之末：大英帝国的黄昏 (1888—1913) 的新解释*

唐昱茵 高 岭 翟润卓

摘 要：帝国研究在 21 世纪重返理论界后再度成为核心议题，揭示西方帝国衰落的因果机制有助于拨开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迷雾。针对英国是否在维多利亚末期落入衰落轨道的经济史争论，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构建的英国 1888—1913 年政治、经济状况的数据集，对“维多利亚的黄昏”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英国在维多利亚末期的经济衰落并没有绝对地表现在盈利能力等直接的经济绩效指标上，而是体现在不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制度因素上。英国企业沿袭的内部承包制发挥的工资侵蚀利润效应超过了效率工资的劳动榨取效应，这可能是导致英国经济衰落的制度根源。本文首次将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视角应用于帝国兴衰的经济史研究，丰富了量化帝国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文献，拓展了量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英国衰落 积累的社会结构 量化历史唯物主义 内部承包制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

——宋玉《风赋》

[作者简介] 唐昱茵，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yytang20@fudan.edu.cn；高岭（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61005，电子信箱：gaoecon@xmu.edu.cn；翟润卓，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邮政编码：100044，电子信箱：runzhuo.zhai@ruc.edu.cn。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国家理论演进及其当代意义研究”（批准号：21C1038408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替前行的原因和机理研究”（批准号：21XJL002）阶段性成果。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杨虎涛和袁富华、武汉大学的彭凯翔、南开大学的乔晓楠、中山大学的梁平汉等老师在本文写作中提供的宝贵建议，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设性修改建议，但文责自负。

一、引言

帝国研究在历史学（Martel, 1991；王章辉, 2000；Middleton, 2011）、政治学（Pitts, 2010；叶成城、唐世平, 2016；叶成城, 2017, 2021）、社会学（Steinmetz, 2016）和政治经济学（布鲁厄, 2003；谢富胜, 2020；塞尔法蒂, 2021）等多个学科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伴随帝国实体在 20 世纪的解体和衰落，帝国研究也走向了式微。有趣的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帝国研究已经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新一轮的“帝国研究”热潮正在形成（Pitts, 2010；库马尔, 2019；俞可平, 2022a）。回顾帝国的历史，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大英帝国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帝国，这是因为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现代化轨道，它也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观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① 根据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世界体系理论，全球经济中心转移是一个长周期，资本主义积累体系先后经历了：“热那亚周期”（15—17 世纪）、“荷兰周期”（16—18 世纪）、“英国周期”（18 世纪末—20 世纪初）和“美国周期”（20 世纪—21 世纪初），东亚周期尚未形成。如果以工业革命为界，工业革命以来的帝国就只有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也更为深远（阿里吉, 2022）。但是，正如蒂埃里·伦茨（Thierry Lentz）和帕特里斯·格尼费（Patrice Gueniffey）在《帝国的终结》中所说的，“是的，美国正在衰落；不，它仍居群首”（伦茨、格尼费, 2018：427）。因此，研究美国周期的时机和条件并不成熟，透视帝国兴衰的一个绝佳样本是英国周期。

维多利亚时代（19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最初 10 年）的大英帝国，可以说是汇集了世人对繁荣、强盛和文明的所有想象。但是，好景不长，维多利亚的“黄昏”暗影已经开始缓缓地浮现在强大的海军、繁华的街市和辽阔的帝国版图之上。回到理论界，有关英国衰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怎样发生的等问题，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他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参见马克思（2016：17）。

至今仍然是尚未被彻底解答的迷思。回顾帝国的历史研究，可以发现帝国的兴盛和衰落有其必然的规律，它是多种因素（军事力量、科技和经济实力、地缘政治环境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某些条件具备时，帝国就会产生和崛起；而当某些条件不复存在时，帝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伦茨、格尼费，2018：427；俞可平，2022a）。然而，这个一般性的宏大框架并没有给出一个解释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走向衰落的微观因果机制。按照 Hobsbawm（1999）对帝国研究范式的分类，非马克思学派的分析家往往排斥经济上的解释，而集中心力于心理、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解释；而马克思学派的分析则非常关注经济上的解释，给予帝国和帝国主义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解释。前者的文献大半不过是在否认当时十足明显、现在也十足明显的事实。因此，本文想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寻求一种对英国衰落的政治经济学新解释。

回顾已有关于英国衰落的经济史文献，对于英国在维多利亚末期是否走向了衰落，以及衰落的原因，理论界并没有形成共识。第一类文献认为英国的确在维多利亚末期走向了衰落，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家失败（Landes，1969；Aldcroft and Richardson，1969）。与之相反，第二类文献否认英国衰落论。唐纳德·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开创性的研究率先发起对英国衰落论的挑战，他基于外生技术的增长理论对英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测度，认为英国经济在1871—1910年间已经将已有资源和技术充分有效地利用，总体达到了当时给定要素禀赋下的最快经济增长速度，因而不存在所谓的“英国衰落”（McCloskey，1970）。一石激起千层浪，麦克洛斯基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英国衰落争论的焦点，后续的研究要么支持他的研究结论，要么反对他对英国衰落的分析方法。整体看，支持麦克洛斯基研究结论的文献占多数，它们从不同角度在宏观层面证实了英国企业家已经尽力在资源配置上做到了最好，从而驳斥了企业家失败假说（Landes，1969；Thomas，1988；Crafts，Leybourne，and Mills，1989；Solomou and Weale，1991）。

然而，如果从内生技术进步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支持麦克洛斯基的立论其实有可疑之处，特别是考虑到英国并没有搭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快车的事实（Crafts，2006）。第一，基于宏观经济总量分析的挑战者从总需求出发，分析英国在维多利亚末期的相对衰落：（1）总需求不足直接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Rostow，1948；Meyer，1964；Coppock，1961）；（2）总需求不足通过维尔顿定律降低了经济体的生产率，进而限制了经济增长

(Matthews, Feinstein, and Odling-Smee, 1982)。平心而论，这个研究路径的挑战其实并不成功。关于总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直接约束，麦克洛斯基完全可以这样反击：如果经济体已经近乎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了，则充分就业就近乎实现，因此，总需求的提升，特别是出口部门的总需求提升，就只会带来物价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会带来整体产出水平的提高。至于考虑维尔顿定律的文献，如果注意到它们是把增长放缓的行业仅局限于纺织品部门，就会发现这一类解释也并不充分 (Crafts, 2006)。

第二，基于制度分析的挑战者则彻底跳出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尝试从制度、政策和生产组织角度研究英国的经济起落。这个脉络的文献同样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沿袭了历史学派的后发国家赶超文献，认为英国的崛起是保护主义政策的产物，而霸主地位的丧失则恰恰是自由贸易政策之过 (邓久根、贾根良, 2015)。与之类似的文献认为，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政府没有能够形成发展型国家，没有能够施行连续的产业政策支持工业投资 (Gamble, 1985; Pollard, 1982; Barnett, 1986; Marquand, 1998; Hutton, 1996)。另一个思路虽然沿袭了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传统，但更加关注制度对生产组织、技术革新和劳资关系的塑造作用 (Lazonick, 1983; Lewchuck, 1987)，从而有一个宏观—微观互动的视角。这个脉络的文献将整个英国经济在 20 世纪的相对衰落归因于英国 19 世纪形成的社会制度的僵化，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

准确地说，英国衰落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市场需求结构和新技术发生变化后，生产组织方式转型失败的结果 (Elbaum and Lazonick, 1984; 高岭、卢荻, 2017)，而生产组织方式转型失败是一系列不良的制度安排导致的恶果。(1) 英国企业家凭借广阔的帝国市场优势，不思进取地固守来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时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并从生产性的工业堕落到寄生性的金融行业 (Hobsbawm, 1999)。这其实支持了企业家失败假说。(2) 工人借助强大的工会索要过高的工资，并抵制技术革新 (English and Kenny, 2000)。(3) 英国政府没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建立起培养技能和创新意识的正式教育体系，不合时宜的教育模式使得工人技能的供给依赖于自中世纪以来行会经济模式遗留下来的师徒制，而车间的劳资对抗和国家的介入不足 (Barnett, 1986; Jenkins, 1988; 封凯栋、李君然, 2018)，最终导致生产组织难以向大规模生产方式转型。

制度分析路径的英国衰落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结论是比较可信的，即

英国对落后制度的继承，阻碍了企业采用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所必需的市场控制权和劳动纪律，这是英国企业与德国和美国等国外企业竞争失败的关键（Elbaum and Lazonick, 1984）。这个分析思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脉络的主线并不明朗，没能定量地把英国衰落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区分开来。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结论是基于案例比较分析得到的，缺乏更严谨的实证支撑和更系统的理论化解释。这是制度分析的经济史研究结论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围绕英国衰落的争论，最终的主流观点导向了这样一个结论：“1914年之前的经济没有经历大规模失败，长期增长率的任何下降都是微不足道的，且美国对英国的超越是不可避免的。”（Crafts, 2006: 17）根据这种观点，针对这一争论，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似乎只是将这一论点用更科学的方法重新表述，以“超越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初局限”（Crafts, 2006: 17）。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研究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终结争论，而只是直接或间接地证明存在某类经济规律或外生因素，使得英国经济无法在这一时期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

为提供一个更连贯和系统化的解释，本文尝试超越纯粹的经济视角，通过借鉴戴维·戈登（David Gordon）、^① 托马斯·魏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等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简称SSA）理论，把制度视角纳入一个开放经济体的资本积累与经济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英国衰落。本文还基于构建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1888—1913年）的独特数据集，对导致英国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生产组织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如风起于青萍之末，国家的经济衰落并不绝对地体现在绩效指标上，而是体现在阻碍资本在未来继续积累的制度因素上。英国企业沿袭的内部承包制发挥的工资侵蚀^②利润效应超过了效率工资的劳动榨取效应，这是导致英国步入衰落的轨道而难以脱困的制度根源。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把量化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帝国兴衰研究，验证了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命题在英国经济史中的解释力。“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命题

^① 亦有译为大卫·戈登。

^② 此处采用“侵蚀”一词是为了与“工资挤压”（当期工资水平与利润率的负向关系）区分开。

长期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较少进行实证检验（Elbaum and Lazonick, 1984）。本文利用 SSA 理论把“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宏大命题具象化为可用于经验研究的理论假说，是对量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个新尝试。此外，本文还把 SSA 理论的应用对象从常见的美国和中国样本（Weisskopf, Bowles, and Gordon, 1983; 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 马艳、王琳、张沁悦, 2016; 孟捷, 2019; 杨小忠、丁晓钦, 2019; 方敏、李梁, 2020），转向了马克思的理论发源地——英国，从而拓展了 SSA 理论的应用范围。第二，不同于已有文献从单一因素视角透视英国衰落，比如企业家失败论（Landes, 1969; Aldcroft and Richardson, 1969）、工会阻碍论（English and Kenny, 2000）、国家过度扩张论（肯尼迪, 1988）和教育失败论（Barnett, 1986; Jenkins, 1988）等，本文为分析英国衰落提供了一个多因素的结构视角，试图把已有的英国衰落假说置于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考察，并基于经验证据定量地考察了影响英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促进“资本权力与经济发展”论题的讨论，并续写了帝国的黄昏故事。关于资本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论和经验都没有形成共识。马克思曾认为资本（家）的权力强化，在短期可以控制和剥削工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和促进资本积累，但从长期看，生产的相对过剩和阶级矛盾激化会侵蚀经济发展，甚至爆发经济危机和革命（马克思, 2016: 612—613）。简言之，马克思认为资本权力会侵蚀长期经济发展。而鲍尔斯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经常发生在资本家的权力弱小的时候，而不是相反（Gintis and Bowles, 1982; 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马克思和鲍尔斯的分歧可以被概括为“马克思-鲍尔斯悖论”。本文的研究结果从侧面检验了“马克思-鲍尔斯悖论”，证据支持鲍尔斯的判断。此外，已有的帝国研究侧重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抽象的理论争鸣（谢富胜, 2020; 塞尔法蒂, 2021; 俞可平, 2022a），量化帝国兴衰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并且聚焦于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叶成城、唐世平, 2016; 李辉、唐世平、金洪, 2014），本文则研究的是英国的黄昏，与已有研究交互辉映，丰富了帝国衰落的谱系。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理论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和对外殖民扩张的红利，英国的国际地位在18世纪走向了顶峰，成为继西班牙帝国之后第二个获得“日不落帝国”称号的国家。但是，当时代的马车驶向维多利亚末期时，英国社会从相对的“安静祥和”逐渐滑向了“混乱嘈杂”：时常保持高位的失业率、平息多年又走向激烈的劳资对抗、国内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以及工业国际竞争力的逐渐丧失。一种不安和焦虑开始弥漫在英国上空，担心大英帝国会逐渐衰落，沦为二流国家（Supple, 1994）。这种不安和焦虑显然源于对英国工业未来的担忧，因为此时的英国经济至少在增速上仍未出现衰败迹象。当时的著名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甚至认为，形势严峻到需要一场政治经济革命来保护英国的工业实力并创建一个新的帝国经济集团（Supple, 1994）。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以德、美为代表的，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的国家，已经在逐渐赶超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布罗德伯里，2001：3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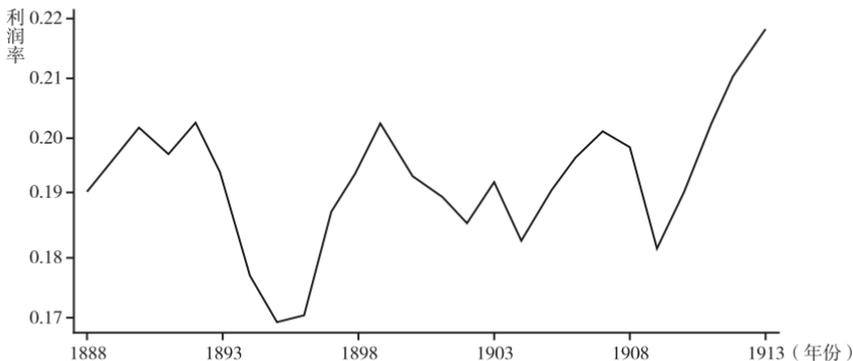


图1 英国利润率：1888—1913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果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很容易知道英国衰落是一个事实，而且衰落之势不可逆转。但是，回到英国衰落发生的时点及其发生机制，这仍然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未解之谜。图1给出了1888—1913年英国的利润率，^①

^① 利润率的计算方法见本文第三部分。

可以发现利润率并无明显下降趋势，甚至在1905年后有一个显著的上升趋势。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理论界就英国是否在维多利亚末期走向衰落及其原因，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以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英国经济在维多利亚末期已经走向衰落（Landes, 1969; Aldcroft and Richardson, 1969）；以麦克洛斯基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彼时英国经济依然走在上升通道上（McCloskey, 1970）。经过激烈的争论，麦克洛斯基的观点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可，主流经济史研究试图为这场争论盖棺定论：“1914年之前的经济没有经历大规模失败，长期增长率的任何下降都是微不足道的，且美国对英国的超越是不可避免的。”（Crafts, 2006: 17）然而，真理未必就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一些坚持历史-制度分析的学者仍然坚持衰落论，而且提供了诸多解释。这些解释包括：生产组织落后论，即英国企业普遍采用的内部承包制是一种落后的生产组织方式，无力与德国和美国等国先进企业竞争（Elbaum and Lazonick, 1984; 拉佐尼克, 2007）；工会阻碍论，即工人借助强大的工会索要过高的工资，并抵制技术革新（English and Kenny, 2000）；企业家失败论，即英国企业家凭借广阔的帝国市场优势，不思进取地固守来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时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并从生产性的工业堕落到寄生性的金融行业（Hobsbawm, 1999）；过度扩张论，即为巩固帝国地位而把大量资源投向了军事和国防建设（肯尼迪, 1988）；教育失败论，即英国政府没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建立起培养技能和创新意识的正式教育体系，不合时宜的教育模式使得工人技能的供给依赖于自中世纪以来行会经济模式遗留下来的师徒制，而国家对车间的劳资对抗介入不足等（Barnett, 1986; Jenkins, 1988; 封凯栋、李君然, 2018）。

诚然，已有解释从不同侧面触及了英国衰落的真相。但是，必须承认帝国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事件，这决定了不能依赖于单一因素解释，而需要一个多因素的结构解释。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资本积累是生产扩张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赵峰, 2004）。但是，资本积累过程既不是在理论真空中自动运行或中止，也不是在现实中以无序的形式出现，而是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支持，即积累的社会结构（Gordon, 1980）。积累的社会结构通过实际工资、贸易条件、利润率和技术选择等途径，影响利润率、劳资分配和劳动生产率（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运行良好的SSA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而SSA的侵蚀则预示着经济衰落的开始。因此，SSA理论可以作为我们透视英国衰落的一个良好的理论框架。

回顾 SSA 理论的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戈登于 1978 年正式提出“SSA”这一概念（戈登，2016），并在 1980 年对 SSA 理论进行了发展完善（Gordon，1980）。SSA 理论强调资本积累过程并不会像传统理论所描绘的那样，是在真空中自动运转或中止，但也并不是在现实中以无序的形式出现。这就意味着，理论上需要说明在最抽象层次上发生或中止的资本积累过程如何与更具体层次上的社会背景（或称生产关系）相结合，也即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出发，对现实中的资本累积提供一个中观层次的制度分析。从一般意义上说，SSA 由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互为关联的四项制度结构所构成：（1）积累的当事人，即企业内部结构；（2）积累的动力，包括竞争结构和阶级斗争结构；（3）积累必备的系统性条件，包括货币体系结构和国家结构；（4）单个资本积累必备的条件，包括自然资源供给结构、中间品供给结构、社会中家庭的结构、劳动市场结构、劳动管理结构、最终产品消费者需求结构、金融结构和经营管理结构（Gordon，1980）。

经过戈登与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迈克尔·赖希（Michael Reich）、鲍尔斯和魏斯科普夫等人的共同努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SSA 理论和实证研究水平达到了它的历史顶峰（Kotz，McDonough，and Reich，1994）。自此之后，SSA 理论基本定型，虽然有些许的批判和扩展的工作（Kotz，2003；孟捷，2016；马艳、王琳、张沁悦，2016；丁晓钦、陈昊，2017），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 SSA 的理论框架。在经验研究上，多采用定性的历史分析方法，而在定量实证层面，或许是因为客观存在的技术困难，这一时期的学者以相关性分析和描述性统计为主要分析手段（Kotz and McDonough，2010）。

不同于国内现有研究倾向于采用“去戈登化”的 SSA 分析框架，本文的基准理论框架回归戈登、鲍尔斯和魏斯科普夫等第一代 SSA 理论家的思路（Bowles，Gordon，and Weisskopf，1983，1986；高岭、唐昱茵、卢获，2022）。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是尤为重要的。这是因为利润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首要目标，也是资本积累动态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利润率很高时，资本积累率会很高，经济会处于扩张阶段；而当利润率很低或者不足时，资本积累率会很低，经济会处于收缩阶段（Moseley，2012）。但是，仅依靠利润率的短期变化来判定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健康状况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做法。回到利润率背后的决定因素，使用支撑利润率的 SSA 为经济“把脉”是极为必要的，也是更深层次的分析方式。

表 1 税后利润决定因素与 SSA 维度

| 税后利润决定因素 | 主要相关 SSA 维度 |
|-----------|---|
| 1. 实际工资 | 资本 - 劳动协议 资本间竞争程度 |
| 2. 劳动强度 | 资本 - 劳动协议 |
| 3. 贸易条件 | 本国相对于外国的权力 |
| 4. 利润税率 | 资本 - 公民协议 |
| 5. 产能利用率 | 资本 - 劳动协议 本国相对于外国的权力 资本 - 公民协议 资本间竞争程度 |
| 6. 投入产出系数 | 资本 - 劳动协议 资本 - 公民协议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 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 的理论框架, SSA 主要由以下四个维度构成, 如表 1 所示。(1) 资本 - 劳动协议, 即在生产组织中的劳资关系; (2) 资本间竞争程度, 即现实中的市场结构; (3) 本国相对于外国的权力, 即国家通过政治或军事实力影响贸易条件的能力; (4) 资本 - 公民协议, 即本国公民可以通过国家机器在某种程度上规制资本的权力 (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SSA 的这四个维度会通过实际工资、劳动强度、贸易条件、利润税率、产能利用率与投入产出系数 (生产技术选择) 来影响利润水平。这里的 SSA 维度在理论上具有一般性, 在实际情形中, 四项维度究竟通过何种因素影响到利润率, 则需要基于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具体分析, 正如我们在下文的计量模型设计中所作的那样。

在 SSA 理论模型中, 利润是净产出经过扣减之后的结果, 其扣减的数量取决于资本家在选定技术条件下相对于他所面对的其他经济参与者的权力大小。在 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 的研究中, 作者基于一个线性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一个开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利润率代数表达式, 并通过劳动纪律 (labor discipline)、贸易条件的决定, 以及税收、政府支出和对经济的调控, 将政治因素引入了单位总产出的利润核算中, 如 (1) 式所示:

$$\pi = \left[1 - a_d - \frac{a_f}{t} - \left(b_d + \frac{b_f}{t} \right) \cdot \frac{a_e}{e^*} \right] \quad (1)$$

其中, π 为利润总额和总产出之比, a_d 和 a_f 是每单位国内产出所消耗的国内和进口的投入品数量; b_d 和 b_f 是工人每小时劳动能购买到的国内和进口的商品数量; $\frac{a_e}{e^*}$ 是每单位产出所需要雇佣的劳动时间, a_e 是一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服务量, e^* 是一单位雇佣劳动所付出的努力的平均水平, e^* 由 a_f 、 a_d 、 a_e 等技术系数决定, 但它会随着工人努力的付出成本情况发生变化; t 为贸易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 e^* 并非是外生变量 (卢荻、李思沛、高岭、李雯, 2022)。根据 Schor and Bowles (1987) 的定义, e^* 是失业损失 J 的增函数。所谓失业损失, 即工人失去当前工作的损失, 可以用 (2) 式表示:

$$J = w^c - [u^d w^r + (1 - u^d) w^n] \quad (2)$$

当 $w^c = w^n$ 时, 得到 (3) 式:

$$J = u^d (w^c - w^r) \quad (3)$$

其中, w^c 为当前工作的薪资水平, u^d 为失业持续期的当年占比, w^n 为下一个工作的薪资水平——这通常是一种预期。而 w^r 则是失业时的收入, 通常是失业救济金。这一损失越大, 资本相对劳动的权力就越大, 因为它衡量了工作的稀缺程度。

最终, 利润率 r 可被表示为 (4) 式:

$$r = uz\pi(1 - \tau) \quad (4)$$

其中, u 为在用资本和资本存量之比, z 为总产出和在用资本之比, τ 为利润率。

事实上, SSA 框架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下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 即通过利润率核算精准测度 SSA 各维度对利润率的影响, 进而以这种联系为切入点, 通过依托质性材料挖掘英国社会的 SSA。因此,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阐释 SSA 框架是怎样和英国衰落联系起来的。

首先, 从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段看, 1888—1913 年在世界史中属于帝国的年代 (Hobsbawm, 1999)。其次, 从理论框架看, SSA 的核心思想是在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与利润率之间建立关系, 或者如 Bowles, Goedon, and Weisskopf (1986) 所说是权力与利润的关系。根据阿里吉 (2022) 的世界体系理论,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是历史资本主义的英国周期阶段。因此,

1888—1913 年的 SSA 可以认为是一个稳定的 SSA。特别是考虑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英国衰落只是初露端倪，美国周期还未开始，这基本就排除了英国在 1888—1913 年处于崩溃的 SSA 的可能。最后，关于利润率与帝国衰落的关系。没有人能否认帝国衰落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同样承认帝国衰落表现在诸多方面。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定语境中，利润率是透视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关键指标；而利润率背后的驱动因素，即积累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利润率上升（至少不下降）能否持续。因此，本文把利润率作为帝国衰落的度量指标。

当然，可能有学者会对此提出疑问：利润率下降与帝国衰落可能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性仍有讨论的空间。我们承认存在这种可能。事实上，本文通过 SSA 框架研究帝国衰落是基于马克思的一个假说，即利润率下降会引发经济危机。^① 如果接受这个假说，我们就可以透过利润率变动及影响利润率变动的因素研究帝国兴衰问题。正因为依赖于马克思的利润率假说，本文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大英帝国衰落的故事，^② 但仍然为理论界研究帝国衰落提供了新视角。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参考 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 的利润率方程，本文设计了计量回归模型：

$$\ln(r_t) = \beta_0 + \beta_1 dfluc_t + \beta_2 war_t + \beta_3 \ln(1 + liparty_t) + \beta_4 \ln(joblos_{t-1}) + \beta_5 \ln(power_t) + \beta_6 \ln(marcon_{t-1}) + \varepsilon_t \quad (5)$$

其中， r_t 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利润率； $dfluc_t$ 是需求波动率，反映产能利用率的变化； war_t 是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的虚拟变量； $liparty_t$ 是自由党

① 对于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危机间是否存在必然关系，理论界至今仍存在争议，不过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利润率下降会导致经济危机。近期一个综述性评论，参见周钊宇（2023）。

② 如果放松马克思的利润率假说，透过 SSA 研究英国衰落会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不在此进行展开，而是留作另一篇文章进行探讨。

执政时间占比,反映执政党对利润率的影响; $joblos_{t-1}$ 是失业损失,反映劳动强度的变化; $power_t$ 是国家的贸易权力,反映政治权力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marcon_{t-1}$ 是市场集中程度,是资本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的逆指标。失业损失、执政时间、贸易权力和市场竞争分别反映了SSA的四个维度,即资本-劳动协议、资本-公民协议、资本间竞争程度、本国相对于外国的权力。此外,SSA的四个维度可以把已有的用于解释英国衰落的生产组织落后论、企业家失败论、工会阻碍论等不同假说,整合到一个初步的实证分析框架中。当然,这需要质性研究材料的辅助,我们会在后面的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中详细讨论这一点。由于诸多历史数据不可得,我们无法直接借鉴传统SSA研究在实证中选取的变量,因此本文在借鉴SSA四个维度的测度思路的基础上,重新选取了变量并构建了一些指标。

(二) 变量说明和指标构建

1. 利润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利润率,最好能在本质上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盈利情况,因此本文需要的是扣除了价格因素的实际利润率。^① 本文选取的1888—1913年英国实际利润率数据来源于Allen(2009),他将Feinstein(1972)整理和估计的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指数进行了修正,把实际收入指数提高了14%,使之等于所有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其中包括自营职业者和领薪者。之所以是14%,是因为“这个比例在整个工业革命中一直保持不变”(Allen,2009)。接着,Allen(2009)估计了农业实际租金水平,进而将实际工资乘以就业人口,将实际租金乘以耕地,再用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扣除这两个数值就得到了实际利润总额。再用实际利润总额除以Feinstein and Pollard(1988:257—471)估计的实际资本存量,就得到了利润率。由于目前缺乏利润税收情况,因此这里选取的是税前实际利润率——事实上,鉴于该时期英国主要奉行“神圣比例原则”(唐顿,2018:139—140),即除较低收入外,对一切收入施行单一的非时变税率,故而税率不会影响税前实际利润率作为经济体盈利情况的指标。

^① 在政治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中,关于利润率是采取价值形式还是价格形式,以及采用什么统计口径,并没有形成共识,参见谢富胜、郑琛(2016)。本文与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1986)的研究一致,采用的是价格利润率。

2. 需求波动。如果不控制产能利用率，即需求侧的变化，那么利润率变化可能并不能反映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尽管长期的需求状况在 SSA 中是内生的。产能利用率有三种基本测度方法：峰值法、随机前沿法和成本函数法。但是这三种方法所需要的数据并不可得，因此，无法用产能利用率度量需求波动。本文根据实际 GDP 真实值和 Allen（2009）采用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所得到的实际 GDP 估计值之差除以后者得到的需求波动情况来直接反映需求波动。对产能利用率与需求波动关系的讨论，见附录 B。

3. 布尔战争。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是 1899 年 10 月 11 日至 1902 年 5 月 31 日英国同荷兰移民后代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最终英国在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与国际舆论压力下，与布尔人签订和约。战争不仅会通过总需求、贸易权力间接影响利润率，还能直接影响利润率。如果忽视战争，就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这也是关于英国衰落的过度扩张论强调的重点，即为巩固帝国地位而把大量资源投向了军事和国防建设（肯尼迪，1988）。本文把布尔战争（ war_t ）设定为虚拟变量，即在第二次布尔战争全面爆发的 1900 年到 1902 年取 1，在其他时刻取 0。

4. 自由党执政时间。本文采用当年执政时间跨度来控制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时所推行政策的影响。例如，若自由党从某年 1 月 1 日执政到 7 月 1 日至 14 日某一天，那么该指标记为 0.5；若从 1 月 1 日执政到 7 月 15 日至 7 月 30 日某一天，那么该指标记为 7/12；若全年执政则为 1。取对数时，本文对自由党执政采取“执政时间 + 1”再取对数的形式，是考虑到当保守党全年执政时，执政时间为 0，这时如果直接取对数会导致观察值的损失。

5. 失业损失。在估计 1888—1913 年英国失业损失时，我们依然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失业统计制度还不够完善，失业持续期的数据并不可得。基于此，本文做出了一个假设，令：

$$u^d = \sqrt{u} \quad (6)$$

其中， u^d 是平均意义上的失业持续期占比， u 为年失业率。这一假设是基于失业率和失业持续期的关系做出的：

$$u = u^d E \quad (7)$$

其中， E 为一年中有失业经历的人数占社会劳动力总额的比例。这一假定

默认有失业经历人数占比的平方等于失业率——后文将指出，此处所做的假定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① 失业率数据来自于米切尔（2002：173），而实际工资数据仍然来自于 Allen（2009）的估算。

另外一个比较难估计的是 w^r 。尽管《新济贫法》发挥着一定的失业救济作用，但本文并不认为基于《新济贫法》设立的“习艺所”发挥着失业保险功能，理由有两点：（1）习艺所救济的“贫民”占人口比重非常低；（2）正常健康成年男性不会考虑在失业状态下进入习艺所。正如克拉潘（2009：549）所述：“在 1885—1887 年商业萧条期人数微微上升滞后（但始终没有超过 80000 人——在 1867 年为数少得多的人口之中曾经有 129000 人），对身体健康者户外救济的平均数字到 1900 年已降至 59000 人；虽然已异乎寻常之低，但 90 年代的平均数却不到 68000。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为皇家调查委员会工作的专门调查人员发现，对于可适当地列为身体健康而精神并无缺陷的男子的有系统的户外救济，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因此，本文认为在 1911 年《国民保险法》颁布之前， $w^r = 0$ ，而 1911 年及以后的 w^r 则按照相关条款规定进行估算（详见附录 B），并根据 Thomas and Dimsdale（2017）的物价指数进行了调整。结合前面对失业持续期比例的假定，并将失业损失滞后一期，就得到了本文所指的失业损失。^②

6. 贸易权力。贸易权力体现在贸易条件上，即出口价格指数减去进口价格指数上，但是贸易条件的绝对值和相对变化又不完全是贸易权力导致的，还可能是国际分工和国内外市场因素导致的，这与本国对他国的权力并不相关。对此，本文采用英国三年平均的实际军事支出对调整后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取其拟合值作为贸易权力。调整后的贸易条件 P_A 为：

$$P_A = (100P)^{\frac{M}{GNP}} \quad (8)$$

其中， M 为出口价值， GNP 为国民收入， P 为贸易条件。这一步调整的意义在于，如果 M 在 GNP 中占比很低，那么就意味着贸易条件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只有当 M 在 GNP 中的占比较高时，贸易条件对于经济体的意义才更显著。Hobson（1993）估计的实际军事支出进行三年平均后，对

① 关于这一假定的合理性讨论，见附录 B。

② 与 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1986）的研究一致，此处假定劳动者根据上一期的失业损失水平决定当期的实际劳动投入。

P_A 进行回归，其预测值即为贸易权力指数。^①

7. 市场集中程度。衡量市场集中度的最优指标显然是 HHI（赫芬达尔—赫尔曼）指数，但目前尚不存在 1888—1913 年的英国 HHI 指数及其相关数据。基于此，本文认为可以将 1888—1913 年英国制造业每年因并购而消失的企业数目的滞后项作为反映市场集中度的指标，原因如下：（1）在这一阶段，制造业在英国经济占有主导地位；（2）数据可得性。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合宜的指标，因为它毕竟忽略了其他行业的情况以及消失的制造业企业在规模上的异质性。我们的并购数据来自 Hannah（1974）的估算。

四、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考虑到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属于时间序列变量，因此有必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后，我们发现所有变量都是单位根变量，但都具有一阶单整性质。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后，本文发现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采用 OLS（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不会存在伪回归问题。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OLS 回归结果如表 2 第 1 列所示。回归结果中，除了市场集中度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外，其余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并且除 *joblos* 的符号外，其余符号均与 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1986）对战后美国的估计的符号一致。本文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它意味着在 1888—1913 年的二十多年间，工资对利润的侵蚀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有理由推测英国衰落的源头之一或许是在当时英国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上，我们将在第五部分对此进行讨论。另外，自由党执政时间的延长对利润率的平均效应为正，再考虑到这一时期实际工资与利润率的对立情况，这可能暗示了 1890 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尝试脱离自由党而自建组织的选择是理性的。第 2 列和第 3 列分别给出了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 HAC（异方差自相关）稳健标准误的回归结果，后者给出的滞后阶数为 3。^② 可以看到，除 *marcon* 外，各系数的显著水平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

① 关于这一指数构建方法的进一步讨论，见附录 B。

② 其中，HAC 稳健标准误对滞后阶数选择并不敏感。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 | (1) OLS | (2) OLS_R | (3) OLS_NW |
|-----------------------|-----------------------|-----------------------|-----------------------|
| <i>dfluc</i> | 1.081 *** (0.322) | 1.081 *** (0.232) | 1.081 *** (0.279) |
| <i>war</i> | -0.068 *** (0.019) | -0.068 *** (0.020) | -0.068 *** (0.018) |
| <i>liparty</i> | 0.137 *** (0.021) | 0.137 *** (0.018) | 0.137 *** (0.015) |
| <i>joblos</i> | -0.307 *** (0.062) | -0.307 *** (0.051) | -0.307 *** (0.055) |
| <i>power</i> | 0.900 *** (0.191) | 0.900 *** (0.170) | 0.900 *** (0.135) |
| <i>marcon</i> | 0.025 ** (0.010) | 0.025 ** (0.010) | 0.025 * (0.012) |
| <i>N</i> | 26 | 26 | 26 |
| <i>R</i> ² | 0.854 | 0.854 | |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数据保留小数点后 3 位。

英国利润率在这一期间有三次大的变动值得关注，其一是 1892 年到 1895 年的持续下跌，其二是 1896 年到 1899 年的回升，其三是 1909 年后的持续攀升。从表 3 中可以看到，在 1892—1895 年的利润率下降期中，对利润率下跌贡献最大的是 *joblos* 和 *marcon*；在 1896—1899 年的利润率回升期中，除 *joblos* 外，*dfluc*、*power* 都有较大贡献；在 1909—1913 年的利润率攀升期中，*dfluc* 和 *joblos* 很明显都是拉高利润率的主因。可见，*joblos* 的波动对英国在这一时期利润率的三次较大波动中有着较大影响。因此，理解它与利润率的负向关系是理解英国这一时期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切入点。

表3 各 SSA 指标在利润波动中的贡献度 (%)

| | 1892—1895 | 1896—1899 | 1909—1913 |
|----------------|-----------|-----------|-----------|
| <i>dfluc</i> | 1.66 | 10.82 | 43.63 |
| <i>liparty</i> | 4.21 | 0.00 | 0.00 |
| <i>joblos</i> | 42.51 | 41.48 | 41.46 |

续表

| | 1892—1895 | 1896—1899 | 1909—1913 |
|---------------|-----------|-----------|-----------|
| <i>power</i> | -2.58 | 8.89 | 6.04 |
| <i>marcon</i> | 10.81 | -3.38 | 14.94 |
| 其他因素 | 43.39 | 42.19 | -6.06 |

注：在 1892—1895 年的利润率下滑区间中，符号为正（或负）表明该变量的变化推动（或阻碍）了利润率下滑。

（二）稳健性检验

首先，考虑到只能在 10% 的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对所有变量展开一阶差分处理后进行了 OLS 估计，即通过考察变量间短期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 中的 3 列分别给出了差分后带不同标准误的 OLS 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各系数的符号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之前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同时，差分回归结果也给出了关于这一时期的英国经济的两点事实：（1）英国对外的贸易权力的变化和国内竞争程度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在长期中显著，但在短期中不显著；（2）工人的失业损失对利润率有负面影响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在长期和短期中都显著存在。

表 4 差分回归结果

| | (1) OLS | (2) OLS_R | (3) OLS_NW |
|----------------|----------------------|----------------------|----------------------|
| <i>dfluc</i> | 0.667 (0.434) | 0.667* (0.323) | 0.667** (0.310) |
| <i>war</i> | -0.046* (0.024) | -0.046*** (0.012) | -0.046*** (0.009) |
| <i>liparty</i> | 0.088** (0.041) | 0.088** (0.037) | 0.088*** (0.029) |
| <i>joblos</i> | -0.271*** (0.086) | -0.271*** (0.064) | -0.271*** (0.058) |
| <i>power</i> | 0.443 (0.619) | 0.443 (0.622) | 0.443 (0.330) |
| <i>marcon</i> | 0.011 (0.010) | 0.011 (0.008) | 0.011 (0.010) |

续表

| | (1) OLS | (2) OLS_R | (3) OLS_NW |
|----------|------------|--------------|---------------|
| <i>N</i> | 25 | 25 | 25 |
| R^2 | 0.613 | 0.613 | |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数据保留小数点后 3 位。

其次，我们替换了 *joblos* 的估计数据，采用了来自英格兰银行的制造业周工资数据和失业率数据（Thomas and Dimsdale, 2017），在确认该变量与其他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后，对其系数重新进行了估计，发现系数变化不大，且依然在 1% 水平上显著。表 5 给出了这一回归结果。

表 5 替换失业损失指标的回归结果

| | (1) OLS | (2) OLS_R | (3) OLS_NW |
|----------------|----------------------|-----------------------|-----------------------|
| <i>dfluc</i> | 0.672 (0.600) | 0.672 (0.619) | 0.672 (0.733) |
| <i>war</i> | -0.058 ** (0.026) | -0.058 *** (0.016) | -0.058 *** (0.014) |
| <i>liparty</i> | 0.132 *** (0.028) | 0.132 *** (0.023) | 0.132 *** (0.021) |
| <i>joblos</i> | -0.276 ** (0.125) | -0.276 ** (0.128) | -0.276 * (0.151) |
| <i>power</i> | 0.838 *** (0.272) | 0.838 *** (0.263) | 0.838 *** (0.282) |
| <i>marcon</i> | 0.028 ** (0.013) | 0.028 ** (0.013) | 0.028 ** (0.013) |
| <i>N</i> | 26 | 26 | 26 |
| R^2 | 0.736 | 0.736 | |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数据保留小数点后 3 位。

最后，我们还替换了利润率的核算方程。根据 Weisskopf（1979）对利润率的分解方法，可以将利润率视作利润份额、产能利用率和产能资本比之积。

本文采用 $dfluc$ 作为产能利用率变化率的代理指标，并将产能资本比作为利润率除以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的结果进行估计。魏斯科普夫指出，利润份额主要反映劳资实力对比，而产能利用率则反映市场需求，前者的下降造成的利润率下滑被称为“工资挤压效应”，^① 后者的下降造成的利润率下滑被称为“实现危机效应”，而产能资本比则主要反映了技术因素（Weisskopf, 1979）。分解情况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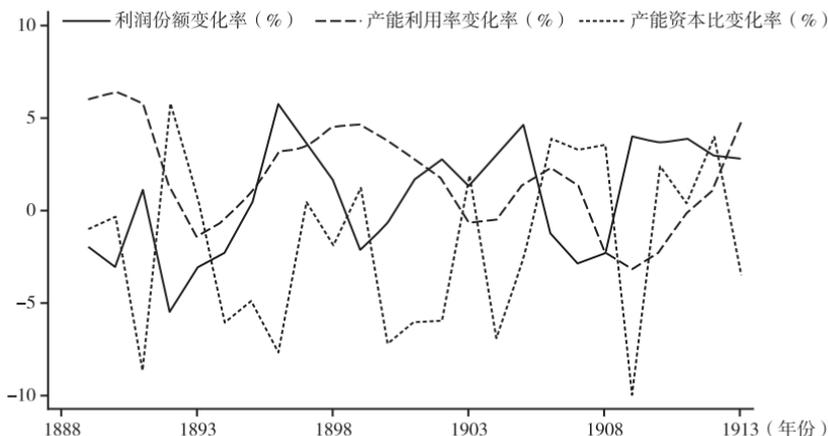


图 2 英国利润率的分解：1888—1913 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可以看到，在 1892—1895 年的利润率的下滑期中，“工资挤压效应”是主因，而“实现危机效应”则是次因；在 1896—1899 年的利润率上升期中，利润率上升是由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的共同提升促成的，而到 1898 年就已经出现了“工资挤压效应”，但产能利用率的持续增长保证了利润率的继续提升；在 1909—1913 年的利润率上升期中，利润份额于 1909 年率先开始的增长进程抵消了“实现危机效应”，使利润率进入上升期——而产能利用率直到 1911 年才开始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产能资本比在过半时间中处于下降态势，并且在约三分之一的时间中出现了超过 5% 的下滑，而几乎没有出现过超过 5% 的增幅。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中，产能资本比的下滑是阻碍利润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而正如下一部分将要阐释的那样，这一现象与 $joblos$ 系数的反常符号可能有着同样的制度根源。

① 这里的“工资挤压效应”是指当期工资提高对当期利润率造成负面影响的效应。

五、进一步分析：失业损失与利润率的负向关系之谜

失业损失与利润率出现了长达25年的负向关系，这与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对美国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我们认为，揭开英国在1888—1913年失业损失与利润率的负向关系之谜，需要回到英国这个时期特殊的企业制度。在一般情况下，失业损失的增加会促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提高劳动强度（高岭、翟润卓、唐昱茵，2022），从而提高利润率。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考察的二战后美国企业就属于这种情况，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是英国企业的什么制度特性逆转了失业损失提高对利润率的正向效应。

根据鲍尔斯的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增加工资除了可以提高消费需求，还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高工资会激励工人更加努力工作，即效率工资的劳动榨取效应；第二，作为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工资可能会侵蚀利润，即工资侵蚀利润效应（Bowles and Boyer, 1988）。因此，如果失业损失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上一期工资水平的提高，^①且工资的利润侵蚀效应大于劳动榨取效应时，失业损失的提高就会导致利润下降。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的企业史研究可以佐证这个理论逻辑。

拉佐尼克研究英国纺织业时，发现了一种独特的企业生产组织——内部承包制。在内部承包制中，工人内部是有等级的：作为“机器看护工”的技术工人和作为“接线工”的底层工人。一方面，企业内部的直接生产过程由少数技术工人负责，他们拥有招聘或解雇底层工人的权力，而其自身相对较少参与或者几乎脱离直接生产过程。而且，由于技术工人工会的存在，雇主通常无法对这些技术工人进行监督，也难以解雇他们，同时还很难削减他们享有的计件工资（拉佐尼克，2007：129—136）。另一方面，雇主通常是将所有工资发放给技术工人，余下的底层工人工资则是由技术工人发放，他们的工资通常是固定的时薪（拉佐尼克，2007：128）。内部承包制的车间生产关系及其决定的工资分配方式，注定会导致工资的利润侵蚀效应压倒劳动榨取效应。这是因为技术工人会凭借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和工会力量向雇主索取

^① 失业救济金相比工资是微不足道的，鉴于英国还远未进入二战后的福利国家阶段，这个假设是合理的。

较高的薪酬总额，而技术工人由于较少受到雇主监督的制约，努力程度又会大打折扣。如果没有监督的制约作为前提，工资并不能起到激励工人努力工作的效果（Gintis and Ishikawa, 1987）。而底层工人领取固定时薪，“维持产量或增加产量对他们并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处。接线工经常会用罢工或放慢工作节奏来反抗纺纱工的过度要求……”（拉佐尼克，2007：130）。这样，底层工人的劳动榨取效应也较弱。因此，从整体看，就是工资的利润侵蚀效应很有可能大于劳动榨取效应，从而出现失业损失对利润率的负效应。

从比较案例视角看，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 的研究对象是二战后的美国企业，不存在内部承包制的生产关系，而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企业存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而且，内部承包制在英国企业中并不是少数，并且至少持续到了一战前（Lorenz, 1991; Savage and Miles, 1994: 49—51）。因此，可以认为内部承包制在失业损失与利润率的负向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反映利润率中技术影响的产能资本比下降趋势也与拉佐尼克（2007：136—143）的判断一致，即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内部承包制还影响着企业的技术选择：“兰开郡的生产关系让机器看护工和管理方制定出有利于劣质棉花使用的协议，如果使用劣质棉花，那么保留自动纺纱机还有别的好处……这一点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纺纱业广泛坚持使用自动纺纱机，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而那时，这些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遗物早已从美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拉佐尼克，2007：143）如果全球技术发展水平是相对停滞的，那么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或许还能像过往一样使英国保持竞争力。不幸的是，这一切发生在前沿技术水平突飞猛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

六、结论

库马尔（2019）在《千年帝国史》的扉页中指出：“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鉴于过去曾经有过的“雅典治下的和平”、“罗马治下的和平”和“英国治下的和平”的历史记忆，不少学者把美国视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俞可平，2022a）。历史上帝国持续的时间，长久者多达千年之上，短命者则只有区区十几年。帝国的产生和兴亡既要遵循一般的普遍规律，也有其各自具体的特殊原因（俞可平，2022a, 2022b）。现代国家崛起的道

路不止一条，而能否增强改革力量，能否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是决定现代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黄振乾、唐世平，2018）。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吸取西方世界大国兴衰的教训，重建“黄金年代”，需要我们对西方帝国兴衰问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以服务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围绕经济史中一个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展开：英国经济是否在维多利亚晚期就出现了结构性的衰退，即维多利亚的黄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英国当时既有的生产关系中，哪些生产关系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哪些生产关系又在其中发挥着消极作用？本文基于 SSA 理论，把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分解为四组关系：劳资关系、本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关系、国家与资本关系、资本间竞争程度。为检验“英国维多利亚的黄昏”命题，本文重新审视了 SSA 理论，对英国 1888—1913 年的实际利润率和相关 SSA 指标进行了梳理，并对英国维多利亚晚期利润率的三次重大波动中各 SSA 指标的贡献进行了量化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失业损失并不像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对实际利润有正向作用，而是恰恰相反。这一看似反常的结果可能反映了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企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的特殊性，即企业内部承包制发挥的工资侵蚀利润效应超过了效率工资的劳动榨取效应，而这一制度性事实的持续存在对英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带来了负面影响。被侵蚀的 SSA 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是渐进的，但这种累积性的负面效应最终会酿成经济衰退的大风暴，这也因应了“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哲理。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演进中资本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权力的扩张有利于控制和剥削工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从而在短期会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是在长期则会有不同的场景：资本权力扩张引导的资本积累必然会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阶级矛盾激化，从而侵蚀经济增长的潜力，甚至爆发经济危机和革命。简言之，资本权力会损害经济发展。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正是企业内部承包制限制和削弱了资本权力，导致英国走向了衰落的轨道。这不支持马克思的观点，而是近似于支持 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6) 的观点，即资本权力弱小会引发资本主义经济衰退。不过，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看，马克思的观点又是正确的，比如 van Bavel (2016) 研究了公元 500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后发现，资本权力会侵蚀经济发展。因此，资本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还需

要进一步探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社会背景下，资本权力与发展间的关系是否一致，本身也是需要讨论的。

本文在理论上尝试对英国 19 世纪末期的衰落问题提出一个相对更为全面的制度视角的解释，创造性地把 SSA 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研究，是对量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个尝试，也是对 SSA 分析方法的拓展。但我们必须承认，本文的研究仍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关于在维多利亚末期，英国企业的内部承包制这一制度因素是阻碍英国生产力进步，最终导致英国衰落的关键因素的观点，仍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寻求更多的经验证据支持。第二，从利润率到资本主义兴衰间可能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本文默认了利润率下降与经济衰退存在必然联系，未来的研究如果能放松这个假设，将会呈现一个更加完整的帝国黄昏图景。

参考文献：

- 阿里吉，乔万尼，2022，《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布鲁厄，安东尼，2003，《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个批判性的考察》，陆俊译，重庆出版社。
- 布罗德伯里，S. N.，2001，《生产率竞赛：从国际比较看英国制造业 1850—1990》，李晓东、常欣译，中国经济出版社。
- 邓久根、贾根良，2015，《英国因何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地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 4 期。
- 丁晓钦、陈昊，2017，《回归与发展：积累的社会结构最新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2 期。
- 方敏、李梁，2020，《社会积累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财经问题研究》第 4 期。
- 封凯栋、李君然，2018，《技能的政治经济学：三组关键命题》，《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2 期。
- 高岭、卢荻，2017，《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吗？——“李斯特经济学”的再评价》，《政治经济学评论》第 1 期。
- 高岭、唐昱茵、卢荻，2022，《背叛者还是创新者：透过鲍尔斯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教学与研究》第 10 期。
- 高岭、翟润卓、唐昱茵，2022，《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及其当代发展》，《经济学家》第 7 期。

- 戈登, 大卫, 2016, 《长周期的上升与下降》, 张开译, 《教学与研究》第1期。
- 黄振乾、唐世平, 2018, 《现代化的“入场券”——现代欧洲国家崛起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治学研究》第6期。
- 克拉潘, 2009, 《现代英国经济史》(下), 姚曾虞译, 商务印书馆。
- 肯尼迪, 保罗, 1988, 《大国的兴衰》, 天津编译中心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库马尔, 克里尚, 2019, 《千年帝国史》, 石炜译, 中信出版集团。
- 拉佐尼克, 威廉, 2007, 《车间的竞争优势》, 徐华、黄虹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辉、唐世平、金洪, 2014, 《帝国的光环: 美国金融危机的历史制度解释》, 《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
- 卢荻、李思沛、高岭、李雯, 2022, 《纳入劳动强度的中国经济增长核算》, 《世界经济》第7期。
- 伦茨, 蒂埃里、帕特里丝·格尼费, 2018, 《帝国的终结》, 邓颖平等译, 海天出版社。
- 马克思, 卡, 2016, 《资本论》第1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艳、王琳、张沁悦, 2016, 《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创新与中国化探讨》,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
- 孟捷, 2016, 《积累、制度与创新的内生性——以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为例的批判性讨论》, 《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
- 孟捷, 2019, 《战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和1973—1975年结构性危机的根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种解释的比较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第5期。
- 米切尔, B. R., 2002,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 1750—1993年》第4版, 贺力平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 塞尔法蒂, 克劳德, 2021,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导读》, 王玥译, 《国外理论动态》第5期。
- 唐顿, 马丁, 2018, 《信任利维坦: 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 魏陆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王章辉, 2000, 《大农业不是英国农业和经济衰落的原因——与徐正林和郭豫庆同志商榷》, 《史学月刊》第1期。
- 谢富胜, 2020, 《当代帝国主义研究的三种范式》,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
- 谢富胜、郑琛, 2016, 《如何从经验上估算利润率?》, 《当代经济研究》第4期。
- 杨小忠、丁晓钦, 2019, 《劳动力匹配、收入分配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稳定性》, 《世界经济》第8期。
- 叶成城, 2017, 《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 《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

- 叶成城, 2021, 《第二波现代化之“帝国的共鸣”——1848年欧洲变革的案例研究和定性比较分析》, 《欧洲研究》第4期。
- 叶成城、唐世平, 2016, 《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殇》, 《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
- 俞可平, 2022a, 《论帝国的兴衰》,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俞可平, 2022b, 《帝国新论》,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赵峰, 2004, 《马克思的增长理论》, 《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期。
- 周钊宇, 2023,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与危机理论——争论澄清与理论地位》, 《当代经济研究》第5期。
- Aldcroft, Derek H., and Harry W. Richardson. 1969. “The Entrepreneur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870 – 1914.” In *The British Economy 1870 – 1939*, edited by Derek H. Aldcroft, and Harry W. Richardson, pp. 141 – 167. London: Macmillan.
- Allen, Robert C. 2009. “Engels’ Pause: Technical Chang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equality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6 (4): 418 – 435.
- Barnett, Corelli. 1986. *The Audit of War: The Illusion and Reality of Britain as a Great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 Bowles, Samuel, David M. Gordon, and Thomas E. Weisskopf. 1983. *Beyond the Waste-land: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Economic Declin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Press.
- Bowles, Samuel, David M. Gordon, and Thomas E. Weisskopf. 1986. “Power and Profit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Postwar US Economy.” *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8 (1&2): 132 – 167.
- Bowles, Samuel, and Robert Boyer. 1988. “Labor Discipline and Aggregate Demand: A Macroeconomic Mode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2): 395 – 400.
- Coppock, Denis J. 1961. “The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1873 – 96.” *The Manchester School* 29 (3): 205 – 232.
- Crafts, Nicholas. 2006. “Long-run Growth.”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ume II: Economic Maturity, 1860 – 1939*, edited by Rodenick Houd, and Paul Johnson, pp. 1 – 24.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afts, N. F. R., Stephen J. Leybourne, and Terence C. Mills. 1989. “Trends and Cycles in British Industrial Production, 1700 – 1913.”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152 (1): 43 – 60.
- Elbaum, Bernard, and William Lazonick. 1984.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2): 567 – 583.
- English, Richard, and Michael Kenny. 2000. *Rethinking British Declin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einstein, C. H. 1972. *National Income, Expenditure and Output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55 – 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instein, C. H. , and Sidney Pollard. 1988. *Studies in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1750 – 19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mble, Andrew. 1985. *Britain in Decline: Economic Policy, Political Strategy and the British State*. London: Macmillan.
- Gintis Herbert, and Samuel Bowles. 1982. “The Welfare State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Marxian, Neoclassical, and Keynesian Approach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2): 341 – 345.
- Gintis, Herbert, and Tsuneo Ishikawa. 1987. “Wages, Work Intensity,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 (2): 195 – 228.
- Gordon, David M. 1980. “Stages of Accumulation and Long Economic Cycles.” In *Processes of the World System*, edited by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pp.9 – 45. Beverly Hills/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Hannah, Leslie. 1974. “Mergers in Brit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1880 – 1918.”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6 (1): 1 – 20.
- Hobsbawm, Eric J. 1999. *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Penguin Group.
- Hobson, John M. 1993. “The Military-Extraction Gap and the Wary Titan: The Fiscal-Sociology of British Defence Policy 1870 – 1913.”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2 (3): 461 – 506.
- Hutton, Will. 1996.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Vintage.
- Jenkins, Peter. 1988.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The Ending of the Socialist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otz, David M. 2003. “Neoliberalism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of Long-Ru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5 (3): 263 – 270.
- Kotz, David M. , and Terence McDonough. 2010. “Global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Terence McDonough, Michael Reich, and David M. Kotz, pp.93 – 1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tz, David M. , Terence McDonough, and Michael Reich. 1994.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des, David S.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zonick, William. 1983.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Cotton Industr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7 (2): 195–236.
- Lewchuck, Wayne. 1987. *American Technology and the British Vehicle Industr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renz, Edward H. 1991. "An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for Competitive Decline: The British Shipbuilding Industry, 1890–197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4): 911–935.
- Marquand, David. 1998. *The Unprincipled Society: New Demands and Old Politics*. London: Jonathan Cape.
- Martel, Gordan. 1991. "The Meaning of Power: Rethinking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Great Brita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3 (4): 662–694.
- Matthews, R. C. O., C. H. Feinstein, and John Odling-Smee. 1982.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856–197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cCloskey, Donald N. 1970. "Did Victorian Britain Fail?"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3 (3): 446–459.
- Meyer, John R. 1964. "An Input-Output Approach to Evaluating British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And other Studie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edited by Alfred H. Conrad, and John R. Meyer, pp. 183–220. Chicago: Aldine Pub. Co.
- Middleton, Roger. 2011. "Brittan on Britain: The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of Democracy Redux."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4 (4): 1141–1168.
- Moseley, Fred. 2012. "A Critique of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of the Price of Capital."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59: 131–137.
- Pitts, Jennifer. 2010. "Political Theory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3 (1): 211–235.
- Pollard, Sidney. 1982. *The Wasting of the British Econom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4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ostow, Walt W. 1948. *The British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ssa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avage, Michael, and Andrew Miles. 1994. *The Remaking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1840–1940*. London: Routledge.
- Schor, Juliet B., and Samuel Bowles. 1987. "Employment R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Strik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9 (4): 584–592.
- Shepard, Walter James. 1912. "The British National Insurance A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 (2): 229–234.

- Solomou, Solomos, and Martin Weale. 1991. “Balanced Estimates of UK GDP 1870 – 1913.”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8 (1): 54 – 63.
- Steinmetz, George. 2016. “The Sociology of Empires, Colonies, and Postcolon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0 (1): 77 – 103.
- Supple, Barry. 1994. “Fear of Failing: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Decline of Brita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7 (3): 441 – 458.
- Thomas, Mark. 1988. “Labour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Nature of Unemployment in Interwar Britain.” In *Interwar Unemployment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Barry Eichengreen, and Timothy J. Hatton, pp. 97 – 148.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Thomas, R., and N. Dimsdale. 2017. “A Millennium of UK Data, Bank of England OBRA dataset.”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research/Pages/onebank/threecenturies.aspx>.
- van Bavel, Bas. 2016. *The Invisible Hand? How Market Economies Have Emerged and Declined Since AD 5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isskopf, Thomas E. 1979. “Marxian Crisis Theory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US Econom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 (4): 341 – 378.
- Weisskopf, Thomas E., Samuel Bowles, and David M. Gordon. 1983. “Hearts and Minds: A Social Model of US Productivity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4 (2): 381 – 450.

附录 A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观察值个数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i>r</i> | 26 | 0.191 | 0.011 | 0.169 | 0.219 |
| <i>dfluc</i> | 26 | 0.019 | 0.027 | -0.031 | 0.064 |
| <i>liparty</i> | 26 | 0.436 | 0.484 | 0 | 1 |
| <i>joblos</i> | 26 | 13.800 | 1.621 | 10.741 | 16.908 |
| <i>power</i> | 26 | 3.088 | 0.116 | 2.946 | 3.329 |
| <i>marcon</i> | 26 | 67.577 | 61.858 | 11 | 255 |

附录 B 核心变量的度量

1. 产能利用率与需求波动率。因为产能利用率反映的是企业对给定资本存量的利用程度，所以当我们把经济的“潜在产出”看作产能利用率达到 100% 时的产出水平时，真实产出与潜在产出之比即可被看作产能利用率的代理指标。本文假定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基于要素投入对产出的估计能够

较为良好地拟合潜在产出，以此获得“需求波动率”这一指标。

2. 失业持续期的估算。根据正文中的（6）、（7）式，可以看到本文对于失业持续期的估算，依赖于有失业经历人数占比二次开根后等于失业率这一假定。考虑到有失业经历人数占比与失业持续期占比相乘等于失业率，且两者都是失业率的增函数，因此任何将失业持续期（以及有失业经历人数占比）设定为失业率小于1且大于0的次方都是合理的。这一设定同时也意味着，相比失业率较高时，失业率较低时的失业率增加会表现为有失业经历人数占比的更快提高。这一假定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直觉基础上：当失业率相对较低时，失业率变化主要是由根据经营情况灵活调整用工的企业带来的；而当失业率较高时，这部分企业多数已经破产，在职人员比例中无法灵活调整用工的企业或政府部门雇员的占比将提高。因此，当失业率较低时，失业率的变化会对应有失业经历人数占比的快速变化；而当失业率较高时，这一对应关系将被削弱。实际上，在确定有失业经历人数占比是失业率的增函数的前提下，无论怎样改变这一函数设定都不会改变失业损失系数为负的结果——而这正是本文的核心关注点。

3. 关于1911年《国民保险法》。《国民保险法》规定缴费主体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缴费义务，标志着英国建立起了强制性失业保险法律制度。该法律规定，英国失业保险所缴纳的费用由工人、雇主和国家共同承担，其中工人每周缴纳两便士半，雇主每周缴纳两便士半。关于失业保险金的领取，《国民保险法》规定，工人从失业后的第二周开始每周可领取七先令，在一年中领取的失业保险津贴的时间不能超过十五周。申领的前提条件是工人每缴纳五次保险金才能得到一周的津贴（Shepard, 1912）。根据估算得到的失业持续期、该法律规定的缴费方式和英格兰银行的物价指数（Thomas and Dimsdale, 2017），本文对1912、1913年的失业损失进行了调整。

4. 贸易权力指数。贸易权力指数的目的在于分离出贸易条件这一经济变量中，受本国对外军事威慑所影响的那一部分，即度量SSA的其中一个维度——本国相对于外国的权力。在指标构建过程中，本文将实际军事支出进行三年移动平均是为了试图度量由连续的实际军事支出所形成的对外军事威慑，而将根据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1986）的方法调整后的贸易条件对移动平均后的实际军事支出进行回归并取拟合值，则是为了将“军事威慑”所影响的贸易条件剥离出来。诚然，这种做法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这一拟合值并不必然反映本国的“贸易权力”。

Every Storm Begins as a Ruffle in the Gras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ilight of the British Empire (1888 – 1913)

Tang Yuyin^a, Gao Ling^b and Zhai Runzhuo^c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a;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b;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c)

Abstract: Since the return of empire studies to theoretical circles in the 21st century, it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to unravel the causal mechanisms behind the decline of Western empires, which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debate on whether Britain fell into decline at the end of the Victorian period,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proposition of “Victorian twil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based on a data se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ariables of Britain from 1888 to 1913. We find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Britain at the end of the Victorian period was not directly reflected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dicators such as profitability, but in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at hindered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wage erosion effect exerted by the internal contracting system inherited by British enterprises outweighed the labor extraction effect, which might be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 of Britain’s declin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to the field of the fall of empires in economic history for the first time, enrich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mpires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quantita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search.

Keywords: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mpir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Quantita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ernal Contracting System

JEL Classification: D20, E20, L23, N34

(责任编辑: 秦 蒙)